

历史真实与记忆书写

——评梁振华长篇小说《新青年》

龙其林,聂淑芬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州510006)

[摘要] 梁振华的长篇历史小说《新青年》展现了作家浓厚的反思意识和对历史小说真实性书写的探索,作家用充满生活逻辑和现实指向的方式来叙说中国近现代史,为人们重新认识1907至1927年间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平台。

[关键词] 梁振华;《新青年》;历史小说;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6)02-0008-05

History Truth and Memory Writing

——Review on Liang Zhenhua's Long Novel *New Youth*

LONG Qilin, NIE Shufen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Liang Zhenhua's long historical novel *New Youth* shows a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reflec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novel's authenticity, and describes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with full-of-life logic and realistic point,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platform for the people to reknow the China between 1907 and 1927.

Key words: Liang Zhenhua; *New Youth*; historical novel; authenticity

—

对于中国作家而言,真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常人们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真实——历史真实或者生活真实。真实,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判别一部作品好坏与否的标准。但饶有趣味的一个显在事实却是,人们对于真实大多有着一种预判,即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客观规律与事实,作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使自己的创作与这种绝对真实缩小距离。即便绝大多数人都难

以经历作品中的那一段段历史,但人们却喜欢以吻合历史真实为作品标榜。然而问题就在于,绝对真实的历史从何而来?作家是如何认识并确定某段历史的真相的?很显然,作家和读者习见的真实性其实并不简单、纯粹,而是夹杂着许多的认识、判断和理解问题。即便如此,在许多中国作家笔下,对于真实性的追求依然是其重要的创作旨归。直逼当下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自不必多说,那些借古喻今的历史小说创作,背后体现的仍然是作家对于过去生活过程和真相的执著追求。对于中国作家而

收稿日期: 2015-08-28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大项目“现代化进程中文学经典的认同作用研究”(2014WZDXM021);广州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课题“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研究”(13C05)

作者简介: 龙其林(1981-),男,湖南祁东人,广州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转型期中国文化与文学;聂淑芬(1989-),女,江西瑞金人,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言,可以说所有的作家都是真实主义者,即便那些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身份昭显于世的作家,其底子上的色调也依然是真实主义的,不过有着客观生活真实、精神真实和想象真实的差异而已。

笔者近年阅读了一些历史小说,愈加领会到历史小说的真实旨归。但令人困惑的是,历史在有的作家笔下成为对于历史教科书的文学演绎,无论是爱恨情仇,还是家国情结,都在验证某种已有的共识或者结论。历史发生学的丰富语境和复杂性,被作家提纯、抽象成了一个符号式的简单人物,历史独特的时空属性、丰富的个人性情在这个过程中被遗忘了。历史的真实性不仅遭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而且也承受着消费主义的蹂躏,其表现为戏说历史、穿越历史和庸俗历史。这两类历史小说的创作势头不减,使得本已面貌不清的历史再次碎片化、神秘化。在思想观念逐步自由、历史事件不断解密的当下,教科书式的历史小说已经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冷川先生是研究文学与历史事件关系的新锐学者,他在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品与历史事件的关系时曾敏锐地察觉到这类作品自身的矛盾:作家“也许不是政治上敏感的人,但面对一堆宣传口号时,他尽可能地调动起了一个小说家组织故事所能使用的手段,结果反倒更清晰地展现出政治话语的矛盾和混杂。这种创作意图和效果相背离的现象,无疑会令我们……对于文学与政治这一核心话题产生更为复杂的感受。”^[1]如果说意识形态对于历史小说的干预还比较容易识别的话,那么消费主义裹挟作家的创作,将历史小说敷衍成完全丧失事实基础的穿越与戏说,则对历史本身会造成更大的误解与遮蔽。正如谢有顺先生指出的,“在这个图像时代,对世界单纯的写实已经不够吓人,所谓的真实,必须被加强,甚至需要加以拼接、修饰或导演,才能起到应有的观赏效果。”^[2]⁵⁰真正深入到历史现场、触及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小说,不应停留在对历史结论的简单演绎或是娱乐化处理,而应该努力客观呈现历史的现场,将昔日的人物、事件加以丰富的呈现,使之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开始自身的行动与思想、情感,以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和精神细节昭示着未来的道路与可能性,昭示出一个时代文化的内在属性,从而引起人们对于未来发展、民族振兴的诸多思考。

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争论,即历史题材的小说究竟应该是以揭示历史“规律”,

以文学创作验证主流历史学家的观点为主,还是以对历史进行一定程度的虚构,为历史人物进行合理的二度创作为主。“争论的实质在于,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种完全客观可感的、立体式的‘历史’,历史究竟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还是一种叙事存在?”^[3]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是‘被叙述’、‘被描述’的,而在‘历史’被叙述、被描述的时候,‘历史’本身早已消逝,只有一些踪影、一些蛛丝马迹保存在所谓的‘史籍’中。保存在‘史籍’中的,只是‘历史’的一堆碎片。‘历史’就像沉埋在地下的陶罐,挖出来时早已破碎不堪;不但掉把、折嘴、破肚、损沿,而且不少碎片早已不翼而飞。更重要的是,这个陶罐本来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本身已不存在,也没有‘图案’、‘样子’可供凭借,如何复原这个陶罐当然是个问题。历史的描述所做的,就是考古学家所碰到的这个难题:想复原历史这个陶罐,但‘原’是什么又不知道。”^[4]可以看出,作为一种过去状态,历史固然是客观的,但是如何呈现历史却并非绝对客观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历史视为一种叙事方式,不同的叙事立场、叙事方式可能会形成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历史“面貌”。由于绝对客观的历史已无法复原,当代人所能做的便是依据所有的材料进行某种程度的恢复,但这种恢复距离真实的历史相差多远很难有准确的定调。让许多人尴尬的是,历史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人的主观色彩。以往将历史视为客观、冰冷过程的认识,忽视历史人物生命体验和情感温度的观念,在今天已经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同。

事情的极端在于,当历史真实的绝对标准消失后,历史虚无主义的观念逐渐浮出水面。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念,在文学、艺术作品的表现就是:历史已经没有客观可言,富于冲突的、戏剧性的情节和矛盾冲突成为了创作者们用力的焦点,它们遮蔽了生活的本来状态,使之演化为经验性的性格冲突、事件冲突。“许多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注意这种本然生活,而是把目光都投向了那种演绎的、虚构的、剪辑过后的生活。电视剧的盛行,展示出的正是这种戏剧人生的魅力。但生活并不会按照小说、戏剧的方式展开,那种危机四伏、命运跌宕、高潮迭出的生活,不过是编剧的一种想象真实的生活更像是散文,没有中心,没有主线,一地鸡毛,但也不乏一些精彩的场面和细节。”^[2]⁵²对于严肃的创作者而言,他们不是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创作,而

是在注意史料、遗迹和记载等资料的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历史环境进行还原,并以严谨的态度对史料语焉不详之处进行合理的假设、合情的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历史小说的创作者本身就同时承担了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他们既需要有学者的严谨和素养,能够依据有限的史料和时代语境,努力还原出历史的面貌,又需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洞察世事人情的睿智,能够在综合地域文化、时代背景、社会思潮、人物生平、著作叙述、文献记载等各种因素之后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与补充。还历史小说创作以真实,不仅意味着要祛除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和藩篱,勇于进行发现和思考,而且还要还历史以肉身,创作者应该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文学家的睿智,让历史具有生活的底蕴和人间的氣息。优秀的历史小说,应该努力弥合历史叙述与历史真相之间的鸿沟,让断裂的时空因素在作品中得到修复。

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振华的长篇历史小说《新青年》展现了作家浓厚的反思意识和对历史小说真实性书写的探索。小说以江流、周鲁、魏国等主人公由晚清至民国20年间的思想成长历程为线索,勾连起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通过丝丝入扣的情节推进,使读者们对中国的近代革命发展史有了更深刻的体认。针对以往近现代史题材小说过于注重历史规律提炼而忽视历史细节的还原,以及过于注重提纯矛盾冲突而存在的乌托邦叙事的缺点,《新青年》用充满生活逻辑和现实指向的方式来叙说繁复的中国近现代史,为人们重新认识1907至1927年间中国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人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平台,也生发出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在历史题材的小说中经常会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革命者的青春,二是真实的生活是否具有显在的逻辑性。第一个问题的实质在于,革命者究竟是一开始就成熟了,还是作为个体处于不断趋于成长的过程。换言之,革命者的形象究竟是定型的,还是不断发展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判断一部历史小说是否吻合真实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些历史小说将人物性格单一化,或者说将人物性格教科书化,这样虽然能够给读者一个比较定型的印象,有时也可以借助人物性格来推进叙事,但与人性的繁复与生活的琐碎本相比,写作

者简化历史、提纯历史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即直接导向历史小说叙事的空洞化与结论化。梁振华很显然并不愿意陷入历史小说的叙事窠臼,他尊重历史,但并不因此而俯瞰真实,而是努力地从生活的本相出发,将平凡而真实的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看待主人公的角度是平视的、对等的,因而也就更能够发现那些传奇或平凡人物直面生活本身时的诚恳、惶惑、挣扎与努力。正是这样一种视角的选择,使得小说的人物形象与主要情节都与时下热播历史剧、畅销历史小说形成了一种陌生化的张力。周鲁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有着粗犷豪放、敢作敢当的一面,但小说显然不愿意将此人物形象如此简单化处理,而是努力揭示出其复杂的性格侧面。周鲁一方面五大三粗豪情冲天,一方面却又对策反广东水师惊愕不已;一方面周鲁面对洋人委曲求全被迫跪地,一方面却秉公执法,杀洋人,烧鸦片。在周鲁身上,我们见不到那种为颂扬英雄人物而遮蔽其自身缺陷的表现方法,而是看到了作家试图还原人性本相所作的努力。作品中另外一个核心人物江流自诩为思想先进的革命者,力图追求新生活,为还紫英自由身而与其结婚却未料直接导致了她的自杀;江流在一边在酒桌上慷慨陈词要将共和之路坚持到底,但当他得知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后却选择了奔赴法兰西求学的逃避之路。正是这些青年的弱点,让这部小说拥有了直面生活本相、还原人物活动空间的质地,使作品跳出了单一性格和情节推动的惯用表现方式,开始朝着立体化的历史人物成长叙事转变。

而第二个问题所反映的是对现实生活及其逻辑的不同理解。在很多历史题材小说中,我们发现人物似乎是单一而惯性的,一种思想从一开始就渗透进主人公的内心,并且从此不变。即便是一些注意到了历史人物思想变化过程的作品,也多表现人物成长过程中由幼稚而成熟的过程,却少有剧作揭示人物思想成熟之后的醒思、自我质疑甚至是自我否定。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人性和思想,也没有一个革命者是接受革命观念后就思想定型了,他们内心的觉醒、挣扎和痛苦无疑有着更为隐秘的思想印迹和情感立场。《新青年》以充满生活气息和人性情怀的场景,将人物还原为真实可感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而非概念化、抽象化的标签。梁振华认为,在纯粹的形式之外,思想内核的“现代性”,应该是中国文艺作品现代品格生成的一个重要来源。他清楚地意识到,在小说创作中将价

值坐标架空,将人性和信仰淡化,转而将笔墨集中在插科打诨的场景、高潮迭起的冲突中,固然可以让小说叙述变得更有可读性,却因此而失去了作为真实存在的历史所具有的本真面貌,人物有血有肉的生活质感也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作为一名新锐作家和学者,梁振华知道哪些东西应该值得自己持续关注和着力表现:“本能的怯弱、恐慌,濒死的颤栗、求生的欲望,人性的阴霾和辉光,对信仰的守护或者放逐——只有通过对这些复杂的东西的体味,我们才能建构起……一种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合乎人道的理解。”^[5]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觉的历史经验和认识,作者在书写作作为时代先知先觉的新青年们时,坚持不溢美、不藏拙的原则,努力描绘这些觉醒者们在追求革命的道路上的幼稚盲目,思想认识的巨大转变,以及此过程中的卑微又高贵的人性。

对于习惯了阅读脸谱化、性格单一的历史小说读者而言,乍一阅读《新青年》可能对作品的情节推进和人物形象塑造颇不适应。造成这种不适的直接原因是,这部历史小说放弃了通常历史题材创作中通用的人物高度概括、典型化的表现方式,而代之以多向度的、多声部的演绎。与一般高度典型化的人物表现方式相比,这部小说叙述速率上显得较为缓慢,人物性格的塑造致力于追求立体、复杂的原生态效果,因此形成了一部充满多种叙事声音的探索性作品。由于作品着力于还原大转型时代以江流为代表的新青年们的生活本相,因此在此前高度典型化、类型化剧作中被定性了的人物性格在这里具有了多义性,主要人物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成了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矛盾的复杂个体。与时下许多插科打诨、轻飘无根的历史小说相较,梁振华的这部小说显然隐喻着更多的哲理思考。在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中描写新青年们面对未来时的乐观、憧憬、困惑与迷失,而且是以正剧的方式强攻历史,与戏说历史、暧昧历史的“趣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梁振华在作品中表现的这种反差,说到底还是在于作者对于自身及历史上的新青年使命感的担当。

在对近现代史上新青年们的体认中,历史与实在作品中合情合理、有理有据地合流了。作家在作品中追述历史,呈现历史,绝不仅仅是为了消费历史、解构历史,而是真正将历史视为了未来的坐标、行动的指南针,是希望以史鉴今,探测前进的路途。《新青年》这部小说,以历史写现实,以理性写

激情,绝不轻视日常生活之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影响,也不忽略那些先知先觉者们的困惑与茫然,而是呈现出逝去历史中那些最平凡、最日常的一面,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力量。

三

《新青年》涉及到的重要历史事件众多,如同盟会在广州筹备的起义活动、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南昌起义等,而小说能以一种真实合理的逻辑重新加以审视,努力揭示其中为时间所遮蔽的妥协与利益博弈。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反清起义,历史教科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中都强调了其对于封建统治的巨大打击和重要的进步意义。但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是,究竟是哪些人参与了这些起义,他们的动机又是怎样的。梁振华并不隐晦重要历史事件中各种力量的较量与妥协,而试图让读者们重新认识中国革命阵营的复杂性。在小说中,同盟会成员许梓秋同革命党人来到广州力图发动起义,而他们争取起义的主要力量居然是作为黑帮组织的三合会会首余汉民。同盟会看重的是三合会的武装力量 and 对于推翻清朝统治的作用,因此采取了怀柔策略,宣布任命三合会会首余汉民为广东都督。当清廷剿灭三合会时,作品中出现了三合会众兄弟一起反抗清廷、横尸寝堂的场景。与主流意识宣教中抽象化、概述化的革命历史叙说相比,这部小说所揭示的革命历史更吻合昔日的历史情形,抽空的历史结论因为这些有血有肉、有矛盾有犹疑的人们的加入,才得以在生活逻辑的情境下得到重新的阐释。读者不难发现历史进程并非后人想象的那么纯粹,而是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冲突、结合与相互利用,并不存在一种单纯到极致的革命历史。

应该注意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之所有可以视为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与它的创作理念和方法密切相关的。梁振华曾如此阐述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本书主人公江流,以张竞生为原型(张竞生原名张江流)。笔者选取了张竞生自参与反清革命到赴法留学再到入北大任哲学系教授的近二十年经历,以此为史料基础,展开了本书大胆的想象与虚构。”^[6]正是由于这部小说以历史人物张竞生为原型,汲取了众多近现代历史史料作为基础,同时又以现实生活诠释历史真实,加以合理想象,才塑造了江流、周鲁、王应、魏国、张若兰等一批具有理想、执著追求而又饱含困惑、精神挣扎的形象。由于有

史料的支撑,所以这部小说虽有不少虚构成分,但整体上呈现出朴实的文风和坚硬的质地。在表现江流等新青年们为国为民族勇于承担的时代精神时,梁振华常常以一位全知全能的智者的姿态,在追溯历史、返回现场的同时,还时常以俊逸的笔调,展现出作者由历史生发的时代之思。由大清末年的衰败到官员们的离心离德,从野心家的倒行逆施到民众心智的逐渐开启,作者似乎从这些细节中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先声,将其提炼为富于哲思的生活片段。于是我们看到,风沙狂舞、电闪雷鸣的景象中,广东水师管带何广成看到了“咱们这大清国,多像是这风雨飘摇的一台戏!个个演得投入,装疯卖傻,到头来无非是还惦记着这身行头”;在江流的自我辩护中,我们看到了先进知识分子们的追求与无奈:“他们正是因为疑惑和绝望,才去寻找合理的秩序与价值,谋求一种新的光明!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位先生,才有了今日的解放。要若是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就要遭到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那么今日的政府和封建专制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指向现实的历史追问,让梁振华的小说具有丰富的时代气息:作者从先人们的理想、热情和期盼中,看到了古今同一的人性与人情,他试图在那些泛旧的历史碎片中重铸新锐青年们的理想与抱负,其中的革新气息和民主、自由诉求,至今仍焕发着夺目的光辉。正是通过这种带有温度的对历史的重新观照,那些散佚在历史深处的故事、信念、情感,那些昔日新青年们的激情与睿智,在梁振华的笔尖全部复活起来。以性灵与性灵相交,借此激活阴冷的史料,梁振华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对于新青年精神的体认。

江流、王应、周鲁们是作为理想的革命青年来进行塑造的,他们在曲折跌宕的寻找革命的过程中接受了社会的洗礼。革命一开始是被这些青年们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加以追求的,他们时刻以革命者自居,并试图凭借实际行动彰显自身的价值:从对传统婚姻制度的质疑,到为自己昔日冲动导致后果的追悔;从立志参加革命以建设平等世界的昂扬斗志,到目睹真正的革命者英雄牺牲而社会依然黑暗无边……一群生活于旧社会而懵懂着渴望新生活的青年们,在残酷现实的教育下开始意识到革命本身的复杂性和漫长性。尤其是当昔日的革命者魏国在清朝覆灭后进入北洋军阀政府,开始与早期的革命者许昌谋取个人利益,淡忘革命理想,甚至镇压敢于反抗者时,小说向读者呈现了革命的工具

性与目的性的奇怪混杂,以及个人在权力面前所造成的异化。如果说周鲁由官兵而“革命”更像是走投无路者的选择的话,那么江流、王应甚至是魏国这几位坚定的革命者人后来的不同蜕变则显示,革命远非人们所设想的那般美好。可以说,反思革命的动机与效果是这部小说叙事的核心推动力之一,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和思想基本上都是围绕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和革命史展开的,而对革命的反思显然是重中之重。甚至小说在对一些边缘人物的表现时,也极为注重他们内心世界的呈现与灵魂的搏斗,显示出了作家看待历史、塑造人物的独特立场。小说中刚加入三合会的阿义得知会首余汉民竟然试图反清时,内心陷入到了巨大的冲突。他一方面感激余汉民对自己的有恩和一年来出生入死的情谊,一方面却在造反、灭门的危险下显露出怯懦的本性,苦苦挣扎,最后在媳妇的催促下写下了造反名单,而这时的阿义也眼窝深陷、满头冷汗。正是由于作家郑重地对待每一个人物,尊重他们的喜怒哀乐与生活原态,才会在对待哪怕一个边缘人物时如此勾勒其抉择的两难困境。

《新青年》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反思十分深刻而形象,作家对历史人物心理历程和时代变迁进行对比,在叙述几个人的个人史诗的同时,生动地再现了一幕幕的历史荒诞剧和革命的乌托邦性质。这部小说的历史叙事既重视思想性的反思,也注意呈现读者们对于真实生活的细节的描写,通过复杂、多义的人物内心呈现,揭示出革命对于青年们思想和人性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奇异影响,从而使作品承担了深沉而锐利的历史反思内涵。

参考文献:

- [1] 冷川.“中东路事件”在左翼文学中的表现[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55.
- [2] 谢有顺.消夏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
- [3] 龙其林.《铁血兄弟》:历史史诗的呈现[J].中国作家(影视),2013(10):153.
- [4] 王学典.史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
- [5] 梁振华.无名的镜语[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110.
- [6] 梁振华.新青年[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415.

责任编辑:黄声波